

# 当代大国相互定位及 时代特征分析

杨洁勉

**【内容摘要】** 值此国际形势面临百年巨变之际，一些大国正在根据综合国力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与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体系变化最大的不同是当前西方大国不再能左右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正方兴未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势不可挡。但是，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将是长期和曲折的进程。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不会轻易与发展中大国分享主导权，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将充满着变化、震荡、斗争与磨合。到 21 世纪中叶，国际社会或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也将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需要深刻认识国情和世情，继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动态调整国家定位，稳定大国关系并推进周边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加快科技创新，提升新公域的治理能力，建设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不负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殷切期望。

**【关键词】** 时代特征 国家定位 大国关系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3-0001-19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3001

人类社会在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迎来了 21 世纪的第三个 10 年和国际形势的百年巨变。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许多全球和地区大国都在为此而调整其国家定位。大国向来是决定国际关系极其重要的因素，而探讨大国的自我定位、相互定位、共同定位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顺应历史潮流，也有利于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进行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 一、大国定位和时代变迁

随着地理大发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开始逐步形成，世界进入殖民和资本大国的争斗时代后，陷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春秋无义战”<sup>①</sup>。但是，国际社会在一战和二战后先后进入“战争与革命”时代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从此掀开了国际关系史的新篇章。

### （一）政界和学界的国家定位

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国家定位既是对国情和世情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国家制定内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

当代大国政界在国家定位时大多是注重现实需要和目标导向，重点关注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权益。美国自我定位为世界领袖和西方盟主。2014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sup>②</sup>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让美国恢复传统的世界中心领导者地位……美国想要领

---

① 诸如英法的“百年战争”（1337—1453 年）、四次“哈布斯堡—奥斯曼战争”（1526—1580、1593—1606、1683—1699、1716—1718 年）、荷西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 年）、席卷全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英普（普鲁士）法的“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拿破仑战争（1803—1815 年）、英法俄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年）等。

② 《奥巴马在西点军校 2014 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4 年 5 月 28 日），中国日报网，2014 年 5 月 30 日，[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htm](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htm)。

导世界，从现在直到永远”<sup>①</sup>。中国的自我定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并将在 21 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普京主政后对俄罗斯的定位是世界大国和当代世界有影响的力量中心之一。<sup>②</sup> 法国认为“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重提“法国精神”，突出“与众不同”，意在重振法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sup>③</sup> 印度则要从单一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外交和军事的综合大国，2019 年 5 月 27 日莫迪在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时表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拥有同一个目标，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以便在未来 5 年内重拾印度在世界秩序中应有的地位。”<sup>④</sup>

学界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国家属性及国家定位与国际体系/秩序的逻辑关系上。中国学者秦亚青认为，“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sup>⑤</sup> 中国学者蔡拓认为，国家定位“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证”<sup>⑥</sup>。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国家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身份一方面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sup>⑦</sup> 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大国的主要界定标准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实力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如重塑国际外交、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促成国际共识、组建军事联盟并解决问题

---

① Michael Pompeo, “Restoring the Role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Speech at German Marshall Fund, Brussels, Belgium, December 4, 2018, <https://www.state.gov/Restoring-The-role-of-the-nation-state-in-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2/>.

② 参见 2000、2008、2013 和 2016 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

③ 马克龙总统 2019 年 9 月 27 日在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引自王珍：《“西方霸权已近末日”，一个有战略远见的判断！》，人民网，2019 年 10 月 11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1011/c1002-31394591.html>。

④ 蓝建学：《印度：新的全球攻势外交》，半月谈网，2019 年 7 月 8 日，[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190708/1000200033136201562549156431619561\\_1.html](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190708/1000200033136201562549156431619561_1.html)。

⑤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 期，第 10 页。

⑥ 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第 121—122 页。

⑦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sup>①</sup> 日本学者神谷万丈认为，一个国家的定位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对外关系互动。地缘环境决定了国家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与不同国家互动的紧密程度决定了该国的外交优先层级，换言之，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收益的地方。<sup>②</sup> 法国学者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则强调在国家定位时要加大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经济等因素的权重。<sup>③</sup>

综上所述，国家定位是一国根据综合国力界定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权益，并决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进步，国家在定位时还要加大历史、文化和道义等因素的权重。而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还需要对国家间的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给予更多的关注。

## （二）大国定位的基础和发展

大国定位始终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但还需要考虑不同时代的条件、特点和大国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大国在确定基本定位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相关政策，以争取更多的主动和主导权。

国家定位的基本依据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而定位于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国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口、领土、自然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客观条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等都符合这一条件。二是全球和地区的治理能力。大国不仅需要具有治理本国的能力，还要在全球或地区治理方面能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甚至发挥引领作用。例如，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能够发挥治理的引领作用，南非在南部非洲也具有这一能力。三是国家的发展潜力。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因其现实力量和发展潜力，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具有大国地位。

---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神谷万丈：『日本のアジア戦略と「インド太平洋」』，『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の日本外交』，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15年3月，113～130頁。

③ 《法国学者：西方应放弃自大 加深了解非西方世界》，参考消息网，2018年6月20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8/0620/2282418.shtml>。

大国在定位时还要确立近、中、远期的发展目标，以此决定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首先，战略目标的发展方向。这是国家定位的大方向，具有鼓舞人心和提振信心的作用。发达大国的目标往往是延续其现有的主导或领先地位，发展中大国的目标具有奋发向上和赶超的特点。其次，战略目标的阶段性和领域性任务。国家在确定长远的总目标后，还需要进行阶段性和领域性的分解，细化和深化的目标便于战略部署、具体落实和梯次推进。再次，战略目标的实施。战略目标的意义在于落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实现其发展战略目标，令世界瞩目。但也有的大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其既定战略目标。例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 1982 年 11 月 27 日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让日本成为“政治大国”，<sup>①</sup> 但日本至今仍未实现这一目标。又如，普京 2008 年提出在 2015—2020 年期间使俄罗斯的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入世界前五强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sup>②</sup>

大国在进行自我定位时，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背景，存在多种国家定位。例如，美欧把世界各国划分为自由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中东国家把世界各国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国际上也有政治上的西方和东方、经济上的北方和南方、综合实力上的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划分。中国把世界各国主要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这种划分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因此，在比较各国的国家定位时，要尽可能地在相同或相近的类别划分中进行。

### （三）大国定位的时代背景

大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是时代的塑造者和推进者。同时，时代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将长期制约大国的自我行动和互动。

第一，近代和现代的时代背景。大国的国家定位和国际互动是在一定的内外环境中进行的，只有充分认识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大国定位与历史发展的互动逻辑，汲取大国成败的经验教训，把握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脉络方向。

---

<sup>①</sup> 顾关福：《战后国际关系（1945—2003）》，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7 页。

<sup>②</sup> 李建民：《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路径与趋势》，《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3 页。

16世纪到19世纪是殖民和资本大国的争斗时代。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发轫和发展时期，西方大国在国内发展经济、改革政治体制和加强军事实力，在国际上主要通过战争来维护和加强其有利地位。西方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充满血腥和残酷，埃及、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文明古国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物极必反，殖民和资本大国在大肆扩张和无耻掠夺之时，也是其走向衰败的开始。正如马克思所洞察的那样：“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为亚洲西方式的革命奠定物质基础。”<sup>①</sup>

20世纪初，已经崛起的美国在孤立主义的旗帜下蓄势待发，欧洲大国却还沉浸在“欧洲中心”的幻境之中。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法国、俄国等组成“协约国集团”，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组成“同盟国集团”。在这两个相互为敌的大国集团厮杀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殖民和资本大国的错误定位既导致了一战，又为苏联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此后，世界进入了战争与革命时代，大国的自我定位、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也具有了时代意义。

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意义在一战后的大国博弈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中继续深化。一方面，欧美大国的相互定位羁绊于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之中，一战“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继续较量，英、美等守成大国和德、日等崛起大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到了无法妥协的地步，最终再次引发了世界大战。另一方面，革命形势也日趋成熟。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中，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全世界传播。在二战后的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达到了历史高潮，大国围绕美苏两极进行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形成了冷战时期的两大对峙集团。

20世纪下半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逐步形成和确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大国之间实际上达成了避免世界大战或核战争的共识，共同管控有限战争并进行裁军谈判。在世界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世界发展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问题总体向好,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梯次增长。1978 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在世界范围内对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强有力推动。如果说欧美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则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发展中大国在维护时代主题和解答时代命题中更是承担起了历史使命,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提供了正能量和发展动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发展。时代观是对一定时期世界形势的总体概括和基本看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源自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思想,<sup>①</sup>列宁根据一战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学说。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等相继发生。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命题的论断。当前,世界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急剧上升,习近平强调在世界百年巨变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sup>②</sup>。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对当前和未来的时代问题和大国定位的指导和遵循。中国努力探索和回应世界从哪里来、在哪里和往哪里去的重大时代问题,在丰富的实践和艰苦的理论探索中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还指导着中国学界的专业研究,促进了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学理研究,加强了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战略等的学科建设,促进了学界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建设的学术贡献。

第三,共同创造和引领、主导。时代问题的实践和认识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世界各国都为此努力实践并作出贡献。同时,在时代的过渡和交替时期,大国如果不能在经济社会基础和思想理论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将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sup>②</sup>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 年 5 月 4 日),《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第 2 版。

在国际社会的进化和突变中，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推动了时代的更迭。由于历史局限，近现代以降的大多数时代主导者是少数西方大国。当今的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发展中大国开始成为参与和开创的主体，这加强了新的时代基础和动力，体现了“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sup>①</sup>的前进方向。

历史一再证明，时代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充满了艰难曲折，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不断斗争和妥协、竞争和合作。发达大国承认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是一回事，与后者分享政治经济权益又是另一回事。在两大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时代观及各自的战略和政策。美欧在东西和南北关系方面并非完全一致，有的发展中大国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希望早日跻身于美欧发达国家的行列。发展中大国群体的综合实力只有实现了与发达大国的基本平衡，才能与之共同主导当今时代和引导未来时代。因此，发展中大国在时代问题上，不可重走发达大国特别是霸权大国的老路，要坚持共同调整和创造，深化全球经济发展合作，超越传统政治思维定式，探索新的主流理论体系，建设互利共赢的体制机制。

## 二、百年大国定位的启迪

一战至今百余年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揭示了时代与大国定位互动的基本规律，留下了有益的经验 and 惨痛的教训，展示了思想理论的进步和困惑，启示着当代和未来的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

### （一）大国定位和作用的时代特征

一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的进步因素在斗争中壮大，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相对平衡；世界各国互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地域和领域；大国定位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辨别，并在实力、利益和道义等方面体

---

<sup>①</sup>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28日），《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1版。

现了时代的特征。

第一，实力基础和实力透支。大国在综合实力方面总是强于一般国家，但过于信奉实力和实力透支也是许多大国衰败的重要原因。英国、美国、苏联等在不同时期都是称雄一时的全球大国，法国和德国在欧洲大陆以及日本在亚太都是地区强国。但物极必反，这些国家不能正确认识其有限的实力和无限的扩张之间的差距，最终受到历史的惩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和全面地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是，中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坚持“不称霸”和“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而作出的选择，也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第二，国家利益的发展辨析。从本质上讲，20世纪以来的西方大国延续了欧美在殖民和资本大国争斗时代的国家利益观，但在战略策略和方式方法上毕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胜利者，可以在自身主导下的全球利益中推进国家利益。欧洲大国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探索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的相互促进。社会主义国家自诞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国家利益进行了革命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列宁主张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但因其早逝而未能在苏联的内外政策中真正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指导和遵循，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在国家利益上又有了新的理论和实践进步，倡导正确的义利观，丰富了当代国家利益的理论和实践。

第三，道义标准的比较竞争。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社会的进步等推动了国家间关系的互动，也提高了对大国的道义标准和要求。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他提议参加的一战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美、苏、英等在二战时共同高举反法西斯旗帜，新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二战后的外交原则基本上是“领导、利益、安全、民主”，欧洲大国特别重视规范、规则和多边主义，印度则强调独立、自主、协商等原则，这些都说明了道义在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国际社会不仅要求大国应对和解答时代的命题，而且要求在思想理论

上进行深入探索，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树立国际关系新的道义和道德标准。

### （二）发展中大国任重道远

发展中大国一般指二十国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即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它们大多为二战后新独立和解放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些国家在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先后开创了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第三世界等集体合作运动，逐步形成了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

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之一，这一群体推动东西和南北力量逐步趋向平衡，促进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但是，发展中大国的强项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方面，今后还需要增加在国际政治、安全、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和影响。发展中大国只有经过漫长曲折的过程和具备质变飞跃的条件，才能彻底纠正历史的不公正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发展中大国在定位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它们总体上自我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但它们的相互定位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中国强调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共性，印度、巴西、南非强调其民主政治共性，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根廷强调地区大国共性。更多的分歧在于它们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互定位。中国把发展中大国视为一个整体，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形成东西政治关系和南北经济关系。印度游走在发展中大国和欧美国家之间，旨在成为东西方和南北间的特殊一方。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等国同美国或/和欧洲的大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显然，发展中大国需要缩小相互间的矛盾分歧，继续提高群体意识，夯实共同定位的基础并聚焦共同的奋斗目标。

### （三）丰富和发展思想理论

伟大的时代需要和呼唤与其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国际社会在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

第一，发扬光大历史进步思想。国际社会尽管还存在许多过时甚至反动

的主导思想理论，但越来越多的大国在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总结出更加符合历史潮流的思想理论，并以此指导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例如、一战后国际联盟宪章中的合理思想部分，二战后法德联手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法国戴高乐总统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思想，以及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提倡的不结盟思想等。因此，“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 360 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 150 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 70 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 60 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sup>①</sup> 此外，一些大国还在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生态、卫生等方面形成共识，进行了全球化时代的思想理论建设。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国理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等的实践中，创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大国理论。与资本主义强调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的大国理论不同，社会主义的大国理论强调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革命、和平共处、殖民地民族等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同时，对国际关系和大国作用等也有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思想和周恩来力推的求同存异思想闪耀着时代的光芒，体现了理论的指南作用。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和命题思想、国际新秩序的原则等，深刻地揭示了大国定位和时代特征的相互关系，对现实和未来的国际关系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中小国家的实践和理论贡献。在现代和当代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虽然大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中小国家的作用也在日益提高。例如，西方的中小国家在地区主义、南北对话、国际维和、中等国家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和理论探索。又如，非西方的中小国家在维护国家政治独立、加快经济增长、推进社会进步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再如，西方和非西方的中小国家共同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挑战

---

<sup>①</sup>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 （四）大国领导人的特殊作用

大国领导人因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定位方面更加需要认清客观形势和正确决策。纵观世界百年风云，不难发现条件基本相同的大国往往会因不同的领导人而产生不同的结局。

第一，大国领导人在本国、本地区和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负有特别的责任。一战总体上虽是非正义性质的，<sup>①</sup>但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等战胜国领导人为战后成立国际联盟所进行的努力也不应被全盘否定。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袖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等领导同盟国集团战胜了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并推动成立了联合国，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领导人在局部战争和代理人战争方面有过许多不光彩的纪录，但是对世界大战和核大战有所顾忌而不敢肆意妄为，客观上避免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在后冷战时期，布什父子总统的作用正好相反。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获得联合国的支持，并见好就收；小布什总统信奉先发制人战略，把联合国抛在一边，一意孤行地发动伊拉克战争，从此使美国开始失去单一超级大国独霸的地位，转入下滑进程。

第二，大国领导人较以前更加重视经济与发展。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国领导人专注于战争和战时经济，很少顾及整体经济与发展问题，但美国还是设计和推行了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安排。二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主题。一方面，美欧和苏东相继实现了战后的经济恢复和转型，世界经济进入较长的增长期。另一方面，美国和苏联的对外扩张和战争又拖累其经济，美国困于越南战争，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冷战结束后，大国又从综合国力竞争的高度看待经济和发展问题，加大了经济结构升级和科技革命的力度，并重视福利、医保和社会稳定问题。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克林顿的知识经济推动了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印度在瓦杰帕伊、辛格和莫迪等总理的领导下经济进入世界前列。普京总统努力改善俄罗斯的经济窘境并倡导了欧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404页。

亚经济联盟等地区合作机制。此外，大国领导人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等也更加重视，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增强了国际社会的全球合作意识。

第三，大国领导人还通过双边和多边会议推进国际议程。随着全球事务的需求增长和国际交通的便捷化，大国领导人的国际会晤和会议频度变密、作用加强，成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重要的机制。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领导人的系列会议为战后安排奠定了基础。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也有机制性的创造。冷战结束后，全球性和地区性领导人会议成为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中大国来说，领导人会议使他们得以在国际重大议题上有了机制性平台，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等。而且，发展中大国领导人还可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争取更多的规制权和话语权，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其风采。

### 三、未来 30 年发展和中国的历史重任

展望未来 30 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之际，世界在沿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继续前进的同时，还将面临许多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困难和挑战。而且，国际社会或许正在开启又一个新的时代，需要世界各国进行正确定位，共同准备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 （一）努力创建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从世界的长周期趋势、阶段性变化、结构性调整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追求等来看，大国在未来 30 年的历史使命将更加伟大和艰巨，需要担当新的时代塑造者和建设者的重任。

第一，大国要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时代主题。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政治安全方面，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和平机制，确立了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国际关系原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国际社会以科技革命为动力，不断优化世界经济结构并推动经济增长，基本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标。当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世界各国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愿望愈发强烈。为此，大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要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特别珍惜综合发展成果，充分利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和国际体系，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框架下应对战争与贫困等挑战。

第二，大国要积极解答时代命题。世界形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面临的普遍性挑战包括但不限于：全球与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全球治理的任务和能力、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生产发展和环境保护、数字革命和网络主权、科技创新和伦理道德、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等之间的挑战和平衡。为此，习近平强调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sup>①</sup> 大国的自我认识要与世界变化同步前进，更要从时代和全局的高度高瞻远瞩和未雨绸缪。在此基础上，大国还要改善现有的国际和地区机制，完善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新机制，补齐诸如国际安全、新公域治理等方面的短板。

第三，大国要前瞻、主动地塑造时代。历史不会因为困难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时代必将根据形势发展而变化。塑造新时代的基础是使经济和科技发展实现新的飞跃，以更加丰富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回应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塑造新时代要有先进、前沿的思想理论，代表新兴和进步力量的发展中大国需要主动承担起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建设任务。塑造新时代还要有新制度的保障，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建章立制中充分体现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大国还要加强东西和南北的沟通、对话和协调，努力避免出现两相对立的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回答乃至解决时代的命题。诚然，进行新时代的物质、理论和制度建设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国际社会对此要有足够的物质和思想准备，把当前的努力和未来的方向有机结合起来。

## （二）大国定位的推陈出新

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在国际形势百年巨变前期以及迎接时代演变的关键时刻，亟须重新审视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前瞻未来 30 年及更远的目标

---

<sup>①</sup>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18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任务，进行符合世情和国情的国家再定位。

纵观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大国定位正确与否导致兴衰的例子俯拾皆是。欧洲大国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顺势而为，美国在欧陆混战时期自强为先，中国在和平发展时代坚持改革开放，如此等等，都成为大国正确定位实现兴盛的例证。相比之下，西方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苏联等跨洲大国虽称雄一时，但终究分崩离析，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前殖民帝国已成“昨日黄花”，德国和日本自不量力地争夺世界霸主而惨遭失败，东方的清帝国、莫卧尔帝国、恺加王朝因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殖民化、半殖民化。时至今日，美国还沉迷于“世界领袖”而对多极化和多边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其错误定位的结果不难想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期，大国的相互定位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一方面，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自诩代表自由民主，但多数国家认为其霸凌欺人，例如，美国是西方的领袖，但德、法等国认为其导致了“西方的缺失”。<sup>①</sup>另一方面，中、美、俄的大国相互定位也发生重要变化，战略竞争性不断加强，一些地区大国也因此而调整了相应的国家定位。在当代大国中，发达大国的相互定位虽有变化但相对稳定，发展中大国的相互定位变数较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着政治多元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现实差异，今后很长时间内将无法形成具有政治凝聚力和战略互信的政治集团。”<sup>②</sup>

大国在建设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处于关键地位，大国之间如果不能在最为重要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达成基本共识，即共同定位，则会陷入经常性的纷争而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前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退群”等已经对国际合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破坏。

### （三）中国的历史重任和战略规划

未来 30 年，中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sup>①</sup>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Westlessness*, p. 5,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

<sup>②</sup> 朱锋：《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28页。

国进程中，需进行更加前瞻和可行的国家定位，在对外关系上辅以相应战略规划，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进行更加紧密的建设性互动。

第一，自我发展和共同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是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国家定位的基础依然是本国的综合国力，首先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作为日益强大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加大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力度。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国家定位需要根据以上战略决策和战略方向，加强实践努力和自觉，完善战略筹划部署，重视外交理论总结和指导，提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制定科学、持续、可行的规划，推进学术、学理、学科建设，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国的自我发展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中国发展强大了，才能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同理，世界和平发展了，中国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还要加大和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努力和担当。中国的五位一体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同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形成共鸣、共识，共同推进世界的发展事业。

第二，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中国是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大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历史使命要求中国继续坚持“大国是关键”的战略思维，坚持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区域领域的合作、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同各类大国进行更加稳定、广泛、深入的合作，也需要不断化解矛盾和避免冲突。能否妥善和有效地处理同各类大国的关系，将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考验。

中国未来需要更加重视自身的大国责任和义务，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

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在物质资源方面，中国需要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但重点是后者，即要努力向世界提供更多物质性公共产品，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更多的引领作用，在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更有担当。在政治外交资源方面，中国需要继续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切实加强全球和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在军事安全方面，中国要在本国强军的基础上，促进并发展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合作机制，为解决重大热点问题作出更多的实质性贡献。在思想文化资源方面，中国需要继续推进自身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sup>①</sup> 在国际交流中取长补短，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共有的主流理论、思想、文化。

中国未来在处理大国关系时还需要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首先要应对好中美关系的挑战，使分歧受控、难题有解、合作可期。中国还要深化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调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大国的多边战略关系，增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中国和其他大国在讨论国际问题和解决热点问题时，需要特别重视中小国家的作用，倾听它们的意见并尊重它们的利益，使其真正成为共同创造历史和推动时代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

第三，发挥亚洲主要大国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是亚洲第一大国，中国的国家定位与亚洲密切相关。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sup>②</sup>

中国要继续巩固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缓和或解决领土和领海争端，补齐地区安全和军事合作的短板，推进大国在周边的良性互动，维护周边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此外，中国还要在思想理念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进一步深化“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发展“睦邻、富邻、安邻”周边外交政策，提高中国和亚洲价值观在世界主流价值观

---

<sup>①</sup>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1版。

<sup>②</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

中的存在感和作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此基础上，中国要与亚洲各国共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进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第四，巩固和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要对这一关系赋予新特点，作出新贡献，从而实现东西方和南北方力量的相对和综合平衡，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继续前进。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要强化战略协调机制，提升经济合作层次，拓展军事安全合作范围，进行联合科技研发，深化文化教育交流等。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长期的影响力，是中国外交未来的重点发展的方向。中国在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基础上，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要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夯实各自的国内支持。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形势的发展，中国同发展中国家还要在治国理政、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文化多样、生态保护、全球治理观、国家责任感等方面进行理论更新和创新，努力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体系，并提高其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 结 束 语

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反复证明，大国的自我定位、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正确和准确的国家定位不仅要客观科学地认识国情和世情，还要充分考虑其他行为体的感受和反应。大国的自我定位、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如能基本一致，就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反之，大国间的分歧和矛盾将会扩大和激化，势必加深国际对立和冲突，阻碍和破坏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

大国在定位时不可刻舟求剑，而应动态调整。大国在看待和处置当前问题时不能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应淡化历史恩怨并加强现实合作。大国在定位时要超越当前事务和议程，不能因急功近利的政策举措而造成大国及整

个国际社会的内斗内耗。大国在定位时还要有长远的战略目标，惟有把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融为一体，才能制定和实现正确的国家定位。否则，就会把当代任务延宕至未来而使其“难产”，或是把未来任务超前至当前而使其“早产”，“难产”与“早产”都与国家正确定位背道而驰并导致破坏性后果。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百年巨变的种种挑战，有些大国已经在调整国家的定位，为此提出新的理念、理论，筹划新的战略和制定新的政策，以期在未来的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秩序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就发展中大国而言，它们仍需要提升群体综合实力，厚植群体性凝聚力和意识，完善各类各级合作机制，形成发展中大国自身以及与发达大国互动的共同定位，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迎接新的时代到来。

还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末开始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着全球的经济、政治、外交、安全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并正在影响着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在人类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这一最为重要的议题面前，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抗疫。中国为此倡导加强国际合作抗疫，并把休戚与共的精神深入到大国关系和全球事务中去。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的声明，对外发出了团结应对疫情挑战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积极信号。当然，也有个别大国走不出树敌对抗的冷战思维，在如此严峻的时刻仍然一意孤行，但这毕竟是历史大潮中的回流和逆流。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当前的疫情及以后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还将继续检验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和地区大国的定位和作用。

为此，中国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时代观和角色观，以实践和理论的高度统一，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同时，中国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动态调整国家定位和全球战略，大力改善和发展内外环境，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责任编辑：孙震海]